

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

闻一多



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

著



著·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 / 闻一多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9
(中学图书馆文库)
ISBN 978-7-108-04080-0

I. ①唐… II. ①闻… III. ①唐诗—诗歌评论②诗歌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5027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唐明星

装帧设计 崔建华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9月北京第1版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 数 146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28.00元

写在前面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字友三、友山，1899年生于湖北蕲水县。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赴美留学。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是爱国主题与唯美主义形式相结合的典范。1925年5月回国，先后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任教。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等古籍进行整理研究，后汇集成《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7月15日参加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人们提起闻一多先生，首先会想到他是诗人和斗士，其次才会想到他是一位学者。对此，朱自清说得最为中肯：“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

从学者的身份来看，唐诗一直是闻一多教学和研究的重点，持续的时间最长。因为在他看来，“唐诗是中国诗的高峰，也是世界诗的高峰；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如果文化被淘汰，这个民族就灭亡了。”

《唐诗杂论》是作者生前拟订的关于唐诗研究的写作计划，由于突然离世，致使最终未能完成（今藏于国家图书馆的闻一多遗稿中，有《唐诗要略》、《陈子昂》等多篇提纲性质的研究文字）。后来汇编成册的《唐诗杂论》中的文章大都发表在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报章杂志上，其内容涉及宫体诗、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杜甫、太白诗英译等多个方面。书中的许多观点具有“立一篇之警策”的功效。如：开篇即提出唐代开国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的论断，指出初唐诗与六朝诗风紧相关联；指出宫体诗的“自赎”是一种蜕化，是从朽陈的母体中蜕出的新生命，《春江花月夜》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由质疑“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指出贾岛对后世诗

人的影响是惰性的中国社会映照……这些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不仅当时极具开创意义，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依然富有启迪。或许这也是此书不断翻印、长销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作为一名诗人，“闻一多对于诗的贡献真是太多了！”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不但创作新诗，还研究和评论新诗。《诗与批评》就是一部评论现代诗人、诗作的作品，内容包括：评介郭沫若、田间、臧克家等新诗人，以及对诗的格律、商籁体、国外的诗歌批评等。现代诗人诗作如何评介，在当时是颇有争议的事，但闻一多先生以“冷静的头脑”和“不对某种诗有所偏爱或偏恶”的态度出发，作出了确切而公道的批评之语，如：《女神》为“时代的肖子”，“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田间的诗为“时代的鼓手”，等等。这些中肯之语使他成为新诗选“颇合乎选家资格”的上佳人选。可惜这些都成了未完的篇章。

闻一多先生遭枪击身亡后，梅贻琦校长决定成立“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学校聘请了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通、余冠英七位教授为委员，朱自清为召集人。1948年8月底，《闻一多全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全集分为八个部分：甲集“神话与诗”；乙集“古典新义”；丙集“唐诗杂论”；丁集“诗与批评”；戊集“杂文”；己集“演讲录”；庚集“书信”；

辛集“诗选与校笺”。之后，北京古籍出版社、三联书店、上海书店都曾据此版影印出版该全集。1999年，我店请陈平原、夏晓虹教授对丙集“唐诗杂论”、丁集“诗与批评”加以遴选校订，将其合为一本收入“三联精选”。本次出版即据之为底本编辑付印。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部

2012年3月

目 录

唐诗杂论

类书与诗	3
宫体诗的自赎	14
四杰	31
孟浩然	41
贾岛	49
杜甫	58
英译李太白诗	78

诗与批评

白朗宁夫人的情诗	93
----------------	----

《冬夜》评论	103
《女神》之时代精神	153
《女神》之地方色彩	165
《烙印》序	175
《西南采风录》序	180
《三盘鼓》序	185
时代的鼓手	188
——读田间的诗	
文艺与爱国	194
——纪念三月十八	
邓以蛰《诗与历史》题记	197
诗人的横蛮	200
诗的格律	202
先拉飞主义	213
戏剧的歧途	232
泰果尔批评	237
谈商籁体	244
论《悔与回》	247

附 录

从宗教论中西风格	253
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	261
新文艺和文学遗产	264
诗与批评	267
艾青和田间	276

唐诗杂论

类书与诗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六一八）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六六〇）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地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

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地分占了一席）。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极小部分。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树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只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太宗时，房玄龄、魏徵、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创，也是很对的。沉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身份相称，自然觉得沉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致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兔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并不是说太宗堆砌的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地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谈一谈。

李善绰号“书簏”，因为，据史书说，他是一个“淹贯古今，不能属辞”的人。史书又说他始初注《文选》，“释事而忘意”，经他儿子李邕补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见义”的地步。李善这种只顾“事”，不顾“意”的态度，其实是与类书家一样的。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簏。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只消举出《群书治要》来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钞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